

趴着求学的路桥“高位截瘫”女孩陈苗苗,因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,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。生病、求学、获奖,每次生命的拐点,她似乎都能努力抓住机遇,与命运抗衡。聚光灯下,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孩的自信与笑脸。不能否认,一路走来,她的背后出现了一群有名字或者没有名字的支持者。他们用行动,去温暖了这个心灵出现过裂缝的女孩,大家似乎都在相信:她可以。这一次,我们采访了陈苗苗还有“扶起”她的几个人。我们想知道,当一个人被命运以痛击时,她和身边的人是如何回应的?他们又是被何种信念鼓舞着?以下是他们的讲述——

她和“扶起”她的人

本报记者卢珍珍/文 李昌正/摄

陈苗苗讲述——

悬崖之上

6岁生病以后,我和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薄膜。那个时候的我,像站在悬崖上,有点摇摇欲坠。旁人给我的反馈,是怜悯、歧视,我接收到的,都是负面情绪。他们说,你以后怎么办啊?我有点失望,好像自己只能烂在那边。鲍文陆老师是第一个给我信心的。7岁的时候,鲍老师骑着自行车,来家里找我。他给我带了一本张海迪的自传,那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,张海迪穿着黑色的衣服,坐在轮椅上,侧影。

他和我讲,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残疾,但现在的她很了不起。鲍老师让我知道,这个世界上,有些人和我一样,但可以过得很好。收到那本书后,我在想,或许,我也可以过得好一点。突然间,我的视野被打开了,外面的世界变得辽阔了。

后来,我去读小学,碰到了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,她叫王金燕。我觉得她很熟悉,像我的幼儿园老师,因为她们俩的额头上都有一颗痣。我对幼儿园还有印象,记得老师很严厉,生病以后,我就没去过幼儿园了,但会想起她。

王金燕老师会积极引导小朋友,平等对待我。别班的小朋友会用那样的眼光看我,但在那个班级,我从没被这样的眼光盯住过。

我读四年级的时候,老师突然去世了。那是个冬天,我经过门卫室,他们说老师去世了。我进了教室之后,还是不敢相信。过了很久,我才反应过来,讲台上的那个语文老师,我不认识了,她已经不在了。

她突然回去世,对我打击蛮大。我可靠的亲人离开了,我不习惯。

那段时间,正好妈妈身体不好,家里的妹妹也才几个月大。我想,干脆放弃,不读书了。

我读小学,每个学期末会收到几百块奖励,但对整个家庭来说,没有任何改善。这一点东西,止不了渴。

四年级下册,我辍学了。学校老师,救过我的陈孔建叔叔,他们都不忍我放弃。那段时间,经常有人过来和我聊。

我很惊讶,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放弃了,应该会像一朵小花一样,谢了就谢了。但没想到,那么多人关心我。他们几乎天天过来,这让我意识到,读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,可能还牵连着他们的心。

五年级上册,我回到了学校。

读书不易

小升初,我面临着失学的可能。接收我这个高位截瘫的学生,对学校来说,他们都有压力。通过教育局还有很多人的帮助,后来,我顺利就读了桐屿中学。

中考之后,因为错过报考时间,我又没地方读书了。

初中,我有几个好朋友,她们和我说,自己考上了哪所学校。但在自己的房间里,没有收到任何信息。

光凭成绩,我和她们是相差无几的。她们都可以读,我却没有办法,这个现实我有点接受不了。

但是,爸爸妈妈动摇摇了。爸爸初中还没毕业,妈妈小学二年级的文化,对他们来说,读完初中已经可以了。

他们说,不要读了吧。我不想就这么算了,我想争取。可是,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
不高兴的时候,我只能通过折磨我自己,来折磨妈妈,因为我知道,她一直爱着我。我只要折磨我自己,她会难受,可能就会屈服。

我不和妈妈说话,自我封闭,不吃饭。我觉得吃饭只是一个外在的需求,没有满足也没有关系。那个时候的我,年纪小,比笨残障,也很偏激。

后来,桐屿中学的戴晓波校长,联系上了蓬街私立中学,他们接纳了我。小学三年级到高中,我都跟着学习。

高中以后,每天早上6点半学到晚上10



一路走来,志愿者们总会在苗苗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

点,我的身体就这样慢慢扭曲掉。每个学期,脊椎都比上个学期要侧弯一些。妈妈用手摸,就能感觉到。

高中有一个英语老师,她是台州学院毕业的,上课的时候,她会分享大学快乐的事情。那个时候,我第一次听到台州学院。

平视生活

小学二年级后,医生告诉我,我的褥疮比较严重,不能久坐,只能趴着读书。小学三年级到高中,是被压抑的状态,我的性格变得阴沉。被束缚的感觉,真的不好。

但是到台州学院后,我又慢慢感觉到自己被释放了。

大学之后,我开始坐在轮椅上听课。我坐在第一排,我有了同桌,我开始平视很多东西。我想让大家知道,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,和他们没有区别。我们在同一片空间里生活,在一个教室里呼吸。

大一,是我和班级同学交流最多的一年。班级的男同学,以寝室为单位,上午下午他们排班来接送我。在教室里,我们也会聊天,同学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我。

大一的暑假,我花了2700元,给轮椅买了一个电动装置。这笔钱,是我助学金的一部分。开着电动轮椅,我可以自己行动,去观察触摸这个世界。

电动装置刚寄过来时,我在调试开关,它一下子动起来,把我的牙都砸出血了。在我妈妈面前,我什么都没说,也不敢说。

小时候坐轮椅,我摔倒的时候,会自己扶正轮椅,再爬上来。后来妈妈一直陪着我上学,我就没再摔倒过。

不过,大学之后,我摔倒过几次。第一次摔倒,是大学。我们在赶路,男生一不小心,把我弄翻了。我记得路上有两个女孩子跑过来,她们一个扶住我的手臂,一个扶着轮椅,男生就抱着我,把我重新放回轮椅。

还有一次,是我开着电动轮椅去桐屿的路上。去的路上坑坑洼洼的,我没注意,开过去,啪,摔倒了。妈妈和妹妹坐在邻居的电瓶车上,开在我的前面,完全没有关注到我。

车翻了,我躺在地上,附近有车来来往往,包括自行车、汽车、电瓶车。有些人会回头张望一下我,但是又开走了。没有一个人停下。

后来我妹妹注意到,我怎么没跟上,就让我妈妈回来。她看我在地上,就把我抱起来。

可能这就是社会和学校的不同吧。事情过去之后,我就不想了。我很少回忆那些痛苦的事,这是我释放压力的方式。

快乐阶段

大二下学期,一个学姐在QQ上找我,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浙江省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,也是第一次熬那么多夜。

获奖之后,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参加比赛,还可以拿奖。而自己学的知识,可以用来应用,它不是书本上的东西,它能化为实践。

它有一种梦幻感。大三开学后,我报名了三个比赛。每次比赛,老师说你们获奖了,噢,又获奖了。我发现,参加比赛,80%的机遇我可以拿到奖。那我就再试试,这一路就开始了……

每次比赛,我都会熬夜,只是熬得多和熬得少的差别。房间里,妈妈和妹妹都睡了,只有我的电脑还亮着。熬不动的时候,靠咖啡撑着,一包不行就两包。

晚上我和老师们说了晚安。但是半夜,我又会在群里发改好的讲稿,一直到早上。

我人生最快乐的阶段,就是今年十月份到十一月份期间。

浙江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,这是第一次以我为主角进行准备的比赛。我有三个指导老师,他们陪我一起改,一起完善的时候,我觉得,如果没有拿到奖,会辜负他们。

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,成了我的下意识。

妈妈的爱

妈妈偶尔会问我,生病那时候她没在我身边,我是不是恨她。我说,这和她没有关系,她出去打工,是想给我更好的生活。

鲍文陆老师来看我之后,我想开很多。那段时间,妈妈也在对我进行一个尝试,让我走出来。

我们家种农田,秋天的时候会晒稻谷。妈妈会从邻居家借一个木制的脱壳机器,只要我摇啊摇,谷子就一颗一颗脱壳掉,掉到簸箕里,妈妈让我过去摇,她去接。我感觉稻谷就像金沙一样泻泻下来,妈妈接住了金沙,好像也接住了我。

慢慢地,我就跟妈妈提更多的要求。我想去外面玩,你要陪我;我想去图书馆看书,你要陪我;我想去公园,你要陪我。

邻居家小孩,比我小两岁,妈妈带我出去玩,总会带上她。所有费用,都是妈妈承担。她让



10多年来,妈妈一直是苗苗生命中最亲密的人,每天以“抱”照顾苗苗起居。

这个小女孩陪我玩,给我找了伴。但这些年,我到现在才明白,以前只知道两个人玩玩挺开心的。妈妈偶尔也会抱怨,最后都会用一句话总结:看开了就好。但妈妈会反复对我说,哪些人帮了我,要我记住,要知恩图报,要更加努力。

我记得是一个冬天,早上雾气很大,周围树影在雾里显得特别朦胧,我去教学楼的路上,太阳慢慢出来,光线刺破了浓雾。那时候还是大一,还是妈妈推着我的时候,特别难忘。

我每天都会记账,记家里的费用。妈妈不想体检,她怕自己查出病来,也不想去治疗,我就带她去了。她脚受伤的那段时间,也是我每天接送妹妹上下学。

现在大四了,我想的,就是找一份工作,努力攒钱。攒到一定程度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,带上妈妈和妹妹,费用我全包。

他人讲述——

唯有读书

陈孔建

我和苗苗是同村人,我是当时的村支书。那个下午,我接到电话,说村里一个小孩发烧,人快不行了。我看到她时,她已经没有了意识。

她妈妈当时不在家,在杭州打工。我和几个人,一起把苗苗送到黄岩第一人民医院,医生说没救了。我们就连夜送她去了杭州,到达杭州时,外面下起了大雪。

杭州的医院把她救回来了,但身体残疾了。苗苗是个漂亮的孩子,一下子从天堂到地狱,我看了伤心。这在她幼小的心理,打了个结。读小学时,读到一半她又不想读了。

校长苦口婆心劝过她,我也问她:以后怎么办?每天趴着身子,父母老了怎么办?她只能读书。

这孩子也好,后来愿意读书了,心有点变动,读书更认真了。

这一路,苗苗遇到了很多好心人。无论学校、部门、社会,都有很多人关心她。苗苗是在爱心中成长的。

我结对资助过很多学生,苗苗只是其中一个。社会发展,读书很重要。现在这个文明社会,知识比什么都重要。

我对绝对的人说,叔叔不需要你们报答,你们把这份爱传播下去。

中学没毕业,我就没读了,现在觉得自己缺少的就是知识。我办企业的时候,曾经给应届毕业生讲过50分钟的课,他们问我,哪个大学毕业的?

我的回答是:社会大学。我想,如果我读书了,现在的路都不一样了。

我当村支书时,在一个论坛上,代表讲话。台下后,别人问我:你是村支书?

我说,不像吗?对方说,不像,你像教授。

他这么一说,对我又是一次心理创伤:为什么我不读书?我把这种遗憾,都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了。

苗苗是个乐观的孩子,从她脸上的笑容,就能看出来。她渴望精彩的人生,对生命、美好生活有向往。她的眼神,别人没有。她没有时间去欣赏这个世界,只有一门心思读书。如果能考上大学,肯定就是个优秀的大学生。

现在,她取得的成绩,成了我特别骄傲的事。她这种精神,能感动心灵上残疾的孩子。如果她能工作,能教育到一大批人。

你的大事,学校的小事

蓬街私立中学董董事长 叶林平

和我联系的时候,桐屿中学的戴晓波校长,已经四处碰壁了。我和戴晓波比较熟,他打电话给我,问学校能不能接纳她。

我听了她的事情,她从小残疾,趴着上课,这个事情感动了我。我认为,作为一个民办学校,应该尽一份社会责任。电话里,我就答应了。

接纳她之后,就必须解决几个问题。她

住的问题,她母亲工作的问题,还有教室安排在哪里,很多实际的问题。

当时离新生开学的时间很紧,这事我就亲自一竿子负责到底。

我们特地选了一个大教室,把教室隔出四分之一,作为她的寝室。她轮椅推出来,就是教室,不需要经过台阶,都是无障碍。

在她住的房间里,我们设立了卫生间,安装了热水、抽水马桶,在教室外面,单独建立了化粪池。

她家条件困难,我们给她妈妈安排了保洁工作,一个月几千元。苗苗在我们这里读书期间,学费是全免的,餐费也是一分不收的。

既然决定接纳她,我们就要安置好她。我们接纳她,是我们民办学校的社会责任。我们如果不接纳她,她的一生可能就前途了。她的母亲不可能一直养育她,她必须要工作。只有读书,是她唯一的出路。

我和她说过,今后可以选一个财务方面的专业,考一个注册会计师,她可能是听进去了。

她刚来的时候,有点自卑。我能看出来她心里的变化,所以我尽可能不去打扰她。尤其她躺在床上,你去看她的时候,她会很不自然,不断整理头发,整理其他东西。考虑这种情况,我和她的母亲,交流比较多。

我就记得和她说过,对你个人来说的大事,但对学校来说,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举手之劳。

因为她,他们班三年来教室都没有变。但从另一个角度,她也为其他学生树立了榜样,改变了学风。有些东西,都是相互的。

她毕业之后,各种渠道,我也都关注到她。她母亲每年都会来一次学校,送一篮桃子。不是什么包装箱,单放篮子里的,这个比买的,价值高很多。她们有感恩的心。

一起成长

台州学院2018级财务管理34班辅导员 徐建伟

我和苗苗是同一年到台州学院的。我到校后的第一个任务,就是带两个志愿者,去接苗苗。

我们驱车到她家时,当时媒体、爱心人士、残联,都等在那边了。

在她家二楼,我看到她躺在自己的床上,床上有很多书,还有一台电脑。第一印象,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很小,趴在那里,抬头望着我们。

专门就苗苗入学的事,学校领导层还开了一个会议。安排她的住宿,达到了拎包入住的条件。宿舍下方,还给她妈妈配了一个厨房。平时,他妈妈也做保洁工作。所有的东西,都给她开通了绿色通道。

除了生活上给的帮助,其他我们都没区别对待。比如,第一次查寝,苗苗的东西比较多,查寝的同学给她扣了很多分,没有偏袒。苗苗很紧张,说保证下次一定会做好,下次她的寝室就很干净了。

我们以为她学习会有困难,没有想到第一年,她考了班级第一。她会把自己的笔记、学习重点分享给班级群里。

一开始,我们考虑给她买张床放在教室,她拒绝了。她想通过坐着上课,逼自己成为一个普通学生,她想融入集体,融入学校。大二的时候,她给自己买了电动轮椅,感觉她解放了自己的天性,心扉都敞开了。

大家关心她,真的是因为尊重她,敬佩她自强不息的精神。她身上的光,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她所吸引,去帮助她。

苗苗是个很有灵气的孩子,我们一起参加了浙江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。她需要改自己的参赛文本、演讲稿。当我们发现问题,她立马拿出手机修改。执行力特别强,这一点非常给力。

从职规赛到国家奖学金评比,整个10月份,我们几乎全程陪着苗苗,周末也过来加班。好几次都忙到晚上十二点,我们让她先回去,结果到凌晨两点,她把修改稿发群里,把我们惊呆了。

这一次,她获得了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,这也是台州学院的第一次。



10月20日,2021年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国家奖学金特别评选大会在杭州举行,陈苗苗在现场评比中脱颖而出,荣获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,成为台州学院首获此项殊荣的学生。

写作是改变命运的机会

本报记者吴世渊

今年1月,我收到一篇“华顶”副刊的投稿,追忆“中国好人”鲍文陆的散文。粗读一遍,故事动人,感情真挚,是难得的好文章。

大约作者疏忽了,文章居然没有标题。我按着底下的联系方式,打电话给这位叫“陈苗苗”的作者。

“喂,陈老师,您好。”我稍做自我介绍。电话里传来轻柔的女声,可以判断,对方是个年轻女孩。她有些不好意思,说不知道有起标题这码事,“不然,你帮我起一个吧”。

于是,我根据文意,将标题拟为《一簇不灭的焰火》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陈苗苗在台州学院读书,是一位坐轮椅上学的学生。

我们熟悉了,偶尔聊天。苗苗对我说,那天在电话里,她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她为“老师”。

这不奇怪,我说,编辑与作者没接触之前,相互不知道底细,“老师”是最礼貌也是最安全的称呼。

之后,她陆续投了两篇散文,一篇《栀子花与母亲》,写和母亲相处的点滴;另一篇《四个夏天》,用四个夏天的片段,来记叙成长体验,都刊登在《台州日报》的副刊上。

我喜欢她的文字。文笔倒是其次,她关于细节的描写,以及一些感受性的语言,若无对生活细腻感知力,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我私下与同事分享:这是位有天分的写作者。

前段时间,我与苗苗见面,闲聊文学。苗苗说,她对文字的好奇,来自鲍文陆。

7岁那年,鲍文陆送了她一本张海迪的自传。书很厚,许多字不认识,她靠翻字典,慢慢阅读。当时的她,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内容,但书为她打开了一扇窗;一个身体同样不自由的人,依靠写作改变了命运。

文学的启蒙,缘于小学班主任王金燕。王老师三十出头,平时较为严厉,却从不吝啬对苗苗的夸奖。

一次语文课后练习,要写一则100字的童话故事,苗苗一口气写了3页,写孤单的小熊,与小兔成为朋友,在森林里一起晒太阳。第二天课上,王老师惊喜地说,苗苗写了好长而且有好有趣的故事,我来给大家念一念。

“原来,我可以这样被表扬,原来……”回忆至此,她的语调忽然上扬,又忽然停顿下来,眼睛里闪过激动与悲伤。

小学四年级那年,这位在她生命中,留下过重重一笔的王老师,意外去世了。苗苗说,从此她的心里缺失了大块,任谁都填不上。

苗苗喜欢阅读,在书里,她能获得愉悦感,仿佛飞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她读杨红樱的《淘气包马小跳》,也读高尔基、三岛由纪夫的小说。

有阵子,母亲常带她去路桥的新华书店,将她抱上楼。在书柜边,她看着书,母亲看着她,一上午的时间悄然流逝。等到网购方便了,她不再去书店,改网上买书。

中学的学业繁重,压力也大。她悄悄在一个论坛网站上,给漫画《犬夜叉》写“同人文”(意思是以此为题材,写一个原创故事)。她笑称,这是段“黑历史”。

高考结束后,她填报的第一志愿,是台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。结果分数刚好扣上,但位次靠后,她被调剂到财务管理专业。

没关系。在大学里,她的成绩总是第一,还获得了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。说明这个专业适合她,她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。更何况,写作与专业无关,只要有兴趣,想表达,随时随地都能写,不是吗?

我无法给苗苗更多的鼓励。她的学习生活经历,可能给予我的鼓励更多一些。我只能以副刊编辑的身份,约她多写稿,投稿,“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”。她笑着点头,说近期就会写一篇。

《读库》的主编张立宪曾说,写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改变命运,不是传统意义上,像张海迪那样,成为一个职业作家,去挣稿费或版权,而是因为,写作是日常生活中,我们最常见的培养成熟心智,认识和发现自己,以及有效而成功地与外界表达沟通的手段。小到日常与他人交往,大到构建内心深处的自我,都可以用写作来完成训练。

我从来不会赋予写作多么崇高的意义。但我认为,张立宪说的很对。

